

政治学论丛

渐进式的超越

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
调整与深化

主编：关海庭 吴群芳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渐进式的超越

——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

关海庭 吴群芳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关海庭等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政治学论丛)

ISBN 7-301-10799-4

I. 渐… II. 关… III. 政治体制改革—对比研究—中国、俄罗斯—现代 IV. ①D6②D75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391 号

书 名: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

著作责任者: 关海庭 吴群芳 主编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799-4/D·15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文辉伟业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6.5 印张 448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中苏两党与体制转型模式的选择 / 7

- 一、中苏体制转型模式与国家的有效控制 / 8
- 二、中苏体制转型模式的形成与独立探索的思想方式 / 15
- 三、中苏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体制原因分析 / 22
- 四、中苏体制转型模式的形成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 30

第二章 中俄改革起点的选择和初始阶段的动力 / 40

- 一、中国农村改革背景分析：改革前农地产权变更的历程 / 41
- 二、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农民 / 46
- 三、中国农村变革：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 69
- 四、苏联(俄罗斯)的农业改革：为什么没有形成合力 / 72
- 五、当代中俄改革起点的进一步分析 / 79

第三章 中苏(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转型模式的选择 / 87

- 一、建国后到改革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 88
- 二、建国后到改革前中国地方工业经济的发展 / 93
- 三、农村——中国中央地方分权的基础 / 103
- 四、地方政府管理技术的发展和地方经济领导人才的产生 / 109
- 五、苏联剧变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112
- 六、中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再发展 / 126

第四章 中苏(俄)决策体制与转型模式的选择 / 139

- 一、转型前中苏中央决策体制的宪政结构 / 139
- 二、中苏两国中央决策体制的实践分析 / 151
- 三、中苏两国决策体制对转型模式的影响 / 158

四、中俄两国决策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完善 / 163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转型模式的选择 / 173

- 一、“文化大革命”：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社会背景 / 173
- 二、“国家悖论”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183
- 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中国转向法治 / 197
- 四、“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渐进主义转型道路的选择 / 201
- 五、中国转型背景同苏联转型背景的比较 / 208

第六章 苏联(俄)的官僚特权阶层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 214

- 一、苏联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初步形成 / 214
- 二、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 / 221
- 三、“转型”背景下苏联和俄罗斯官僚特权阶层的状况 / 227
- 四、普京改革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俄官僚特权阶层的发展趋势 / 235
- 五、俄罗斯官僚特权阶层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 240
- 六、俄罗斯官僚特权阶层的危害对中国反对官僚主义的启示 / 241

第七章 中苏(俄)两国的中间阶层与转型模式 / 245

- 一、中苏两国转型前的利益分化与中间阶层发展状况 / 245
- 二、中俄两国转型模式对利益分化与中间阶层发展的影响 / 252
- 三、转型中的利益分化和中间阶层对转型模式的反作用 / 274
- 四、中俄两国加快中间阶层发展的基本思路 / 278

第八章 中俄政治文化传统与转型模式的选择 / 290

- 一、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与体制转型的特点 / 291
- 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体制转型模式选择 / 304
- 三、中俄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 / 309
- 四、体制转型与中俄政治文化的重塑 / 321

第九章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一) / 334

- 一、理论上的回顾 / 334
- 二、中国渐进性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化 / 338
- 三、渐进转型模式的局限和面临的障碍 / 344
- 四、深化渐进转型的基本思路 / 362

第十章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二) / 378

一、俄罗斯近期的社会状况的一般分析 / 378

二、普京对俄罗斯转型模式的调整 / 386

三、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优势和问题 / 394

四、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比较与深化 / 402

后 记 / 415

前言

如果以人口和领土面积作为参照系,中国和前苏联无疑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巧合的是,20 世纪后半叶,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历经艰辛、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过程,并在 20 世纪的历史上展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活报剧,至今还留下了众多令人回味的话题。

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执政党和国家在其中始终保持有效控制,是社会转型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柳暗花明,即普京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的明显效果,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这也是本书论述的主题之一。

人们通常说,中国的社会转型采用了渐进式的模式,而俄罗斯采用了激进式的模式,这种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中国在基本采用渐进式的转型模式,始终保持国家有效控制的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某些阶段,也采取了激进有效的措施向市场过渡;而俄罗斯由于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模式,一开始就通过“休克疗法”和“公开化”急剧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的激烈动荡,本来应该进行的某些改革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如福利制度的改革等,这样反而使经济改革的很多措施贯彻不够彻底,用俄国学者的话讲,叫做“假性市场经济”。无怪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转型渐进当中有激进;俄国的转型表面上很激进,实际上后来被迫转向渐进,很多转型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普京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带有“补课”的性质。普京从 2000 年担任总统以来,其社会改革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打击寡头干政。俄罗斯社会转型二十年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总量下降了 60%,但同时却冒出了极少数暴富阶层,很显然这是不正常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痛恨。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对富有者表示痛恨的占被调

查者的46%；少数人的暴富过程伴随着极其复杂的犯罪活动。普京一上台，大刀阔斧，对少数暴富者进行调查，最典型的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被判处九年监禁。

(2) 重组政党格局。俄罗斯政坛长期面临着国家杜马与总统的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政治运行的效率。普京担任总统以来，间接地组建了“统一俄罗斯”党，这个党在国家杜马的450个席位中占据了300多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议会和总统对峙的局面随之消解。

(3) 改革联邦体制。普京上台后，改变了议会上院（联邦院）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要行政长官担任上院议员的做法，而改由各加盟共和国、州推荐联邦议员，并明确规定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要领导人不能担任上院议员，以便他们更好地从事行政领导工作。

(4) 加强中央集权。普京逐步改变了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要行政长官完全由普选产生的状况，先是往各地方派驻总统代表，负责监督检查联邦中央各项命令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接着从2005年3月开始，各地方进行选举的候选人要由联邦总统提名，经总统提名后由普选产生，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5) 进行社会改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取消了一些人具有的免费休假、乘车的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偿；提高退休人员的工资；提升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的基本工资水准。

(6) 整合价值体系。普京明确提出，要整合社会价值体系，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石。具体说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社会团结，应该作为俄罗斯的基本价值观，以更好地把人民团结起来。

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力图恢复对国家的有效控制。

诚然，渐进和激进转型模式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的学者意见分歧也比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转型就被认为是成功的。这方面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的评述。斯蒂格里茨写了不少文章赞扬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他在比较中俄两国的改革时指出：“关于改革速度和次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①另一种观点则在转型结果的标准中附

^① [美]斯蒂格里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199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因素。例如,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的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在对比了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一方面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只是一种“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①。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等国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这样的改革变化的力度不大,GDP 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

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认为激进转型进行了宪政改革,民主制度日益健全,这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前景,社会风气也将日益好转;而渐进性的转型模式政治改革相对落后,特别是宪政系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转型中很多关键的问题都积累下来,尤其是一些得到了好处的既得利益阶层很可能成为转型的阻力,这将会导致转型深入的动力不足,甚至有可能走向新的专制。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论的过程。这其中有三个问题是要深入研究的:一是俄罗斯全面实行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地方自治等诸多制度也充分到位,但是其制度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腐败严重、效率低下、甚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俄罗斯所建立的民主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原因在于,俄罗斯民主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并没有与社会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普京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但也有人指责普京“限制新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使“民主倒退”,要“回到苏联时代”。二是当前俄罗斯经济确已出现稳定、快速发展势头,但却与民主制并无多大关系。俄罗斯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外部条件,即石油价格的高涨;其次也得益于普京对所谓民主制的“背弃”,或者说得益于他运用强硬手段弱化民主制进而实现经济所需的政治稳定。三是中共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和自身的净化能力,综合起来称作“执政能力”,这种“执政能力”是不能低估的,西方很多学者,主要是按照西方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中国的渐进转型,对中共这种自身的“执政能力”往往有着很大的偏见,这是我们要不断提醒他们的。当然,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就是以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转型的有效控制,容易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阻碍改革,这个既得利

^① Kornai, *Halfway and Byways*, MIT Press, 1995.

益阶层有发展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的可能。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既得利益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这是本书论述的另一个主题。

中俄两国的社会转型正向前发展。两国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两国的转型越向前发展,其难度越大,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群体已经形成,任何一项改革的深入,都会程度不同地触及到某些集团、阶层的利益,因而也就必然地引起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是社会的震荡。运用比较翔实的资料进行客观的研究,为两国转型,特别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找到更科学的“路径依赖”,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现实的改革有推进作用,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目的之一。

综上所述,本书的主题可以概述如下: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保持国家对转型的有效控制,是转型成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采用渐进性转型模式逐步调整人们的心态和价值体系,符合两国复杂的国情背景和制度本身的特性。但这种渐进的转型模式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从而增加转型的阻力;因而,需要通过加强执政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建设,力求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断将社会转型推向深入。根据这一主题,本书将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综合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以及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有关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展开论证。本书各章的逻辑关系如下:

第一章为总论部分,从宏观上论述保持国家的有效控制、坚持独立探索锐意改革的思维模式、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体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从中苏两党的角度揭示中苏两个原本都是实行集中计划体制的国家为什么会分道扬镳,走上了迥然不同的转型道路。

第二章至第八章为分论部分,分别从中俄改革起点的选择和改革初始阶段的动力、中央和地方关系、政治决策体制、转型的不同社会政治背景、利益分化及中间阶层发展状况、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两国转型模式形成的原因以及不同模式选择对两国各自的改革进程及其绩效的影响,指出了不能抽象地谈论渐进转型的合理性问题,因为激进和渐进各自有复杂的国情背景,论证由国家来主导的转型,必须保持有效的国家控制。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以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为个案,分析中俄体制转型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对体制转型的深远影响。

第九章和第十章为对策部分,综合论述了世纪之交中俄体制转型模式

的调整与深化,指出两国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打破现有的制约,把转型进一步引向深入。转型模式的调整和深化也要围绕保持国家有效控制的问题,同时要消除腐败,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法治,在法治的前提下,有秩序地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让人民群众决定权力的归属。走法治化的道路是两国共同的选择。

人类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随意割裂。对于既往的历史,人们可以进行思索、借鉴,但是不能割断、抹杀。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善于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前进道路,这是转型成败的关键。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它却是唯一可行的改革和复兴之路。

中苏两党与体制转型模式的选择

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转型,有其特定的含义,特指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集权向分权,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型可分为两种基本的模式,即渐进式和激进式。中国体制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模式,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一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革,“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①。二是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为起点,“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②。三是改革每走一步都进行试验,“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③。这样就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有一个比较和逐步接受新体制的过程。

中国坚持渐进的体制转型模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坚定了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之相反,前苏联在体制转型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少应有的信心,从而导致转型模式的选择错误和社会的严重动荡,而错误的转型模式反过来又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进一步混乱,加剧了错误指导思想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可见,体制转型模式选择的意义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③ 同上书,第113页。

不言而喻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中苏两国共产党在理论认知、领导体制等领域的重大差别不仅对党的性质及执政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两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迥然不同的重大变迁。认真分析两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不同特征,从中汲取经验与警示,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一、中苏体制转型模式与国家的有效控制

中苏两国的体制转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种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都是由国家启动的。这种由国家启动的社会改革,要想取得成功,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保持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控制,特别是有完整的垂直控制的行政体系。

这是因为原来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种完整的体系一般都是以官方意识形态或统一的价值观作为基础的。人们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要想改变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人们在一开始还看不清楚市场经济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只能逐步探索,如果搞不好,就会出现混乱。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改革进程的有效控制。仅以改革开放以来四次投资过热为例:第一次投资过热是1982—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30%;第二次投资过热是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25.4%;第三次投资过热是1993年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40%;第四次投资过热是2003—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25%^①。每次投资过热后,中央都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如直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对重大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批等措施,使其降至合理的水平。更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改革、有条件地出售中小企业,都是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下实行的。当然,这种严格的行政控制也会加大“摩擦成本”,甚至会出现腐败现象,但总的判断,还是利大于弊,因为不这样做,或者完全放开,同样会出现“动荡成本”,腐败现象可能会更严重。

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失误是一开始就摧毁了有效的行政控制系统。俄罗斯学者对此有过充分的论述:“的确,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社会

^①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四次投资过热的经验和教训》,载《中国国情国力》2005年第4期。

主义选择’,也就是保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他却削弱管理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杠杆,试图用以‘完全核算’为主要内容的新手段取而代之。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创新,如实行公开性,采用‘新的经营’(合作制、租赁企业等),重新评价‘非劳动收入’概念,通过苏联‘关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总则’法等等,扩大了企业经理们经营自由的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变革方针也势在必行,因为企业经理们毫无自由,完全服从上级,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也破坏了苏联经济的基础,削弱了诸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供应委员会、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经济权力。而这对苏联经济体制构成了威胁。”^①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改革摧毁了苏联经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而没有这一基础,不仅不能加速科技进步和集约化,而且苏联经济本身也如同在革新前一样,不能有效运作。”^②

中国的改革也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为什么就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有效的行政控制呢?这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加强行政控制和经济领域放开不是矛盾的,或者说叫“一紧一松”。

中国改革一开始“放”的步子是很大的。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在城市的工厂,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包死基数,保证上缴,多收自留,歉收自补。无怪乎很多俄罗斯学者把中国的改革称作“激进式”的改革。但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系统通过法律、政策、行政控制等手段,严格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运行。而俄罗斯搞了公开化,行政控制在削弱,但采取的经济措施其实是很保守的。具体分析一下:

1. 关于“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和人民自治”,“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他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并提出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手段。

“经济集约化”,就是改变企业、科研院所各自独立的状况。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组建“规划建筑联合体”的尝试。规划建筑联合体,是将原

① [俄]Л. Я. 科萨尔斯、Р. В. 雷美金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石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先独立的企业——建筑安装局、建筑材料供应机构、建筑研究所等机构组成一个单位。这些联合体的任务是保障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联系,消除单位和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在建筑行政管理机构中加入这一新的管理环节,并没有改善基层单位——建筑安装局、工厂、建筑队的工作情况。”他们通过对 1987 年按照“上级”指令建立的一家西伯利亚规划建筑联合体进行调查后得出了如上结论。学者们共对 640 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 380 名工人进行了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组建规划建筑联合体只达到了增加工资的目的,而没有达到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目的,其中生产的物质技术供应、建筑产品的质量以及技术更新情况尤为糟糕,改变这种情况已经迫在眉睫。在调查中,有 66% 的负责人和专家认为,随着规划建筑联合体的组建,建筑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均未受益”^①。

2. 关于农业领域实行租赁的情况。初看起来,实行租赁承包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俄国学者在 1989 年调查的 32 个租赁企业中,劳动生产率几乎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企业负责人认为,职工的工作情况明显好转,按技术要求去做,爱护设备,节约原材料等等。……但是,在租赁承包情况下,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节约下来的成本并不意味着可以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最终由企业负责人决定。所以,工人的期盼虽然乐观而强烈,但很少能够实现。1986 年,租赁企业的每个工人的产值提高了一倍多,但所领取的工资却与其他非租赁企业一模一样。后来,这种未能实现的期盼导致人们对企业的私有化和农业的家庭承包制持小心谨慎的态度^②。

3. 在农业领域实行集体承包。这旨在通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1986 年,俄罗斯学者对承包企业和非承包企业(实行个人计件工资)的职工劳动情况进行了比较社会学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旧的经营方式和新的经营方式之间,在生产经营的条件和效益以及职工的积极主动性方面,并无明显差别。……因为承包企业与非承包企业的区别仅在于企业名称和会计核算方面,而不存在任何其他差别”^③。

4. 关于“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加速战略”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所谓“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1986 年 5 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

① [俄]Л. Я. 科萨尔斯、Р. В. 雷美金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第 8 页。

② 同上书,第 9—10 页。

③ 同上书,第 9 页。

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布《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的措施》，拟定实施经济、组织、法律、教育性质的一整套措施来保障严格遵守社会公正原则。《措施》指出，所谓非劳动收入，就是对社会无益的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及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等，要更加严厉地追究捞取非法收入者应负的责任。《措施》对擅自利用国家的运输工具、机器和器械者处以 100—200 卢布以下的罚款^①。从 1986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这些措施对贪污受贿实行最严厉的惩罚。根据受贿情况可以处 5—10 年徒刑，受贿数量特别巨大者可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措施》还第一次规定对居民收入实行国家监督。购买物品交易额超过 1 万卢布以及建造住宅超过 2 万卢布的公民，必须向财政机关申报钱的来源^②。

这些措施和后果是令老百姓满意的。然而与非劳动收入斗争还包括一个主要内容：与所谓投机倒把者即“二道贩子”的斗争。根据规定，凡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不是生产该产品的人，即犯有投机倒把罪。甚至农民在市场上贩卖高产作物如西瓜、土豆等均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这就使“加速战略”的贯彻出现明显矛盾：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使企业（包括集体、私人的企业）行为积极化，发展市场关系，如 1986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的《个体劳动活动法》，似乎鼓励从事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却又号召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限制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5.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1987 年 6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变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实质是使各级国有企业由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以经济管理的领导方法，转向以利益和通过利益来进行管理，转向管理的广泛民主化和大力调动人的因素。主要内容包扩：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通过法律管理企业；实行“国家订货”。

关于“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改革首先试图取消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订货”。《根本改变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决定对“国家订货”作如下解释：国家为了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向那些能够提供解决全国社会任务、完成科技纲要和巩固国防所必需的某些种类的产品，为全联盟和共和国储备提供农产品的企业实行订货。国家将向

① 参见[俄]《真理报》1986 年 5 月 28 日。

② 参见[俄]《真理报》1986 年 6 月 2 日。